

教育部推荐中学生必读书

童年

Jong nian

[苏] 高尔基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ДЕМСМВО

童年

торский

[苏]高尔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童年/ (苏) 高尔基 著; 曾冲明 译. —长春: 时代
文艺出版社, 2005. 8

(世界经典名著必读文库)

ISBN 7 - 5387 - 1992 - X

I. 童... II. ①高... ②曾...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 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555 号

童 年

作 者	(苏) 高尔基
译 者	曾冲明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 m a i l	shidaiwenyi@126.com
印 刷	长春市南关区文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7 千字
印 张	5.62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在昏暗拥挤的房间里，我父亲躺在窗台下的地板上。他身着白衣，个子特别长；两只光脚板，奇怪地伸着趾头；他慈祥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胸上，手指也是弯曲的。他快活的眼睛紧闭着，眼眶像两枚黑铜钱。他和善的面孔也变黑了，还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半身裸露着，穿一条红裙跪在那里，用那把我喜欢拿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将父亲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到脑后。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嗓音浓重而嘶哑。她灰色的眼睛周围全肿了，又仿佛在融化，泪水大滴大滴地往外流。

外婆拉着我一只手。她圆胖胖的，大脸庞，大眼睛，有一个滑稽可笑的软鼻子；她全身黑黑的，软软的，特别有趣。她也在哭，但好像很特别，仿佛在给母亲伴唱帮腔。她浑身颤抖，使劲儿把我往父亲身边拉；我站着不动，往她身后躲，我害怕，又害羞。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婆多次说的话：“跟爹告别吧！你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了，不到岁数，没活到自己的年纪……”

那时我重病初愈，刚刚能下地。生病期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看我，后来他突然消失了，顶替他的是外婆——一个奇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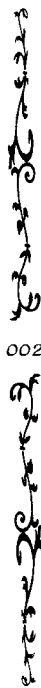
“你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从上头，从尼日尼。但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不能走，小人精！”

这话真可笑！也听不懂。我家楼上住着满脸胡须、染着头发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的是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可以骑着楼梯的栏杆打盹溜滑；要是掉下去，还可以翻个筋斗——这是我熟悉的。哪里谈得上什么水呢？她的话全错了，糊涂得好笑。

“我怎么会是小人精？”

“因为你爱嚷嚷。”她也笑着说。



她说话亲切、快乐又流利。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搅得我心不安,但我觉得新奇: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平时很严厉,话少;她身上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个儿又高又大,像一匹马;她身板儿硬实,两只手特别有劲儿。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披头散发,身上臃肿不堪,衣服全撕破了。头发平时梳得整整齐齐,像一顶白色大帽盘在头上,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脸上,耷拉到赤裸裸的肩头;编成辫子的那一半摆来摆去,触动着父亲熟睡的脸。我站在屋里已经很久了,可是她没有看我一眼——她梳着父亲的头发,不断地抽泣,泪水好像噎住了她的嗓子。

两个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派出所一个警察伸头往屋里瞧。警察生气地吆喝:“快点儿抬走!”

窗户是用黑披巾遮着的,它被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风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划一艘张开风帆的木船。忽然一声炸雷,父亲笑了,用双膝紧紧夹住我,大叫了一声:“没事儿,别怕,鲁克!”

突然,母亲从地板上费劲儿地挣扎起来,马上又坐下,接着仰面倒下,头发散乱地铺在地板上。她眼睛闭着,煞白的脸变青了。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闭上眼……阿列克谢,出去!”

外婆推开我,自己奔向门口,喊道:“亲人们,不要怕,别动她!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分娩。请原谅,爷们儿!”

我躲到黑暗角落里一个高箱子后面,看母亲在地板上缩着身子滚动,只见她痛苦地哼着,格格地咬着牙关。外婆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高兴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住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害怕。她们在父亲身边折腾,碰他、又哼又喊,可是父亲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母亲不只一次地站起又倒下。外婆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里滚出来;接着,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子哭了。

“感谢主!”外婆说,“是个男孩!”

她点上了蜡烛。



我一定是在墙角里睡着了，别的我都不记得了。

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二幕是雨天公墓荒凉的一角。我站在一个溜滑的粘土小丘上，望着放着父亲棺材的大坑。坑底有许多水，还有些青蛙——有两只已经爬上黄色的棺材盖。

坟旁边有我、外婆、湿淋淋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满脸怒气的乡下人。暖和的细雨，像珠子一样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说，他走到一旁。

外婆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乡下人弯下腰，忙着往坟里撒土，打得水啪啪地响。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慌忙往坑两边爬，土块把它们打到坑底。

“走吧，廖尼亚！”外婆扶着我的肩头说。我身子一扭，摆脱了她的手——我不愿意走。

“你真是的，主啊！”外婆埋怨了一句，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低下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

两个乡下人啪啪啪地用铁锹拍打着墓穴。一阵风吹来，把雨刮跑了。外婆拉起我的手，领我穿过许多黑十字架，向远处那个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想哭就哭吧！”

“我不想哭。”我说。

“既然你不想哭，那就不哭好了。”她轻轻地说。

说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哭也只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身上疼。父亲总是笑我流眼泪，母亲也总是呵斥我：“不许哭！”

后来，一辆四轮小马车载着我们在一条很脏的大街上走着，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我问外婆：“青蛙能爬出来吗？”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愿上帝保佑它们！”

父亲和母亲——他们谁都没有这样频繁、这样亲切地念叨着上帝。

几天以后，我、外婆和母亲乘轮船旅行了，我们的座位是在小舱里。生下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死了，躺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裹着白布，外面用一条红带子捆着。

我跪在包袱和箱子的行李堆上，从那又鼓又圆、像只马眼睛的小窗口往外望：湿淋淋的窗玻璃外面，混浊的流水不断地泛起泡沫，有时候浪花溅到玻璃上。我禁不住要往地板上跳。

“不要怕。”外婆说。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接住我，又把我放到包袱堆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黑色的土地，但马上又在雾与水中消失了。身边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两手放在脑后，靠着船壁僵直地站着。她脸色阴暗、铁青，双眼紧闭，像个瞎子，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生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婆不只一次地低声劝她：“瓦里娅，你吃点儿什么，哪怕一点点儿，好吗？”

她还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轻言细语，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一点儿，但像是小心翼翼，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理解这一点，所以跟外婆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大声而且生气地说，“水手哪去了？”

连她的这些话也令人奇怪，感到陌生：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蓝衣服、白头发的人，他送来了一个小箱子。外婆接过小箱子，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放好后，外婆双手端着走到门口。但是她人胖，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这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前不知所措，样子真是可笑。

“你呀，妈妈！”母亲大叫了一声，从她手上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却留在舱里，端详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

“怎么，是你的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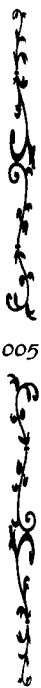
“那么萨拉托夫是谁？”

“是个城市。你往窗外看，那就是！”

窗外，陆地在移动。那黑暗、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像刚切下的一大块圆面包。

“外婆上哪儿去了？”

“埋外孙去了。”



“把他埋到地里吗？”

“那还用说？当然埋到地里。”

我告诉水手，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紧紧地搂住，吻了吻。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哩！”他说，“青蛙用不着可怜，上帝保佑它们！你可怜你妈妈吧——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

我们头顶上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所以没有害怕。这时，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拔腿就跑，一面说：“要快跑！”

这时我也想跑着离开这里。我走到门外，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离门不远，扶梯上镶的铜闪着光。往上看去，我看见人们手里提着背囊和包袱。显然，大家正在离开轮船——也就是说，我也应该离开轮船。

可是，当我随着人群来到船舷上搭的靠岸踏板跟前，人们对着我嚷嚷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推我、拽我、摸我——这样有好长一段时间。最后，那个白发水手来了，他一把抓住我，解释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上船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到船舱里，往包袱堆上一塞，就走了，还指着我吓唬说：“看我揍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小，轮船已经不颤动了，也听不见拍打水面的哗啦声了。窗户好像被一堵湿墙挡住了，舱里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堆也好像胀大了，把我挤压在中间——一切都不妙呀！也许我一个人就这样永远留在这艘空轮船上了吧？

我走到门口，门开不开，门的铜把手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尽全身力气猛击把手。瓶子打碎了，牛奶洒在我腿上，流到靴筒里。

我因失败而痛苦，便倒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哭着哭着，含着眼泪睡着了。

醒来时，轮船又在哗啦啦地拍打着水面，不停地颤动。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像火红的太阳。外婆坐在我身边梳着头，一面

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些什么。她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披盖住了两肩、胸脯、两膝，披散在地板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一只手往上提起沉甸甸的头发，另一只手费力地用稀齿的木梳梳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绺。她嘴唇歪着，黑眼睛闪着怒气，脸在这么多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今天她看上去很凶，但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样长，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语调说：“看来这是上帝的处罚：罚我梳好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为这把马鬃夸耀；现在老了，我烦死它了！你睡吧！还早哩——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

“我不想睡了！”

“那就不睡吧。”她立即表示同意。她编着辫子，不时地往沙发床那边看，母亲躺在那里，脸朝上，身子直愣愣地像根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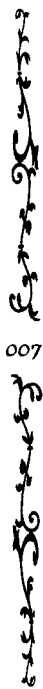
“昨天你怎么打坏了牛奶瓶？你说话小点声！”

外婆说话好像在精彩地唱歌，她的话语像温柔、鲜艳、浆汁外溢的花朵，不费劲儿就牢记在脑海里。她微笑的时候，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儿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流露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虽然黑皮肤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脸仍显得年轻光泽，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黑色的银饰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穿的也是全身是黑，但通过眼睛，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快乐而温暖的光彩。她弯着腰，几乎是驼着背，个儿很矮。可是行动轻快而敏捷，比得上一只大猫——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

她没来以前，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但她一出现，就叫醒了我，领我到了一个光明的地方；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组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一个我最贴心、最熟悉和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一生中最早的这些美好日子。

天气好极了。从早到晚我和外婆呆在甲板上，头上是明朗的天空，伏尔加河丝织锦绣般的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黄金。淡



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它不慌不忙，懒洋洋地用轮桨旋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低沉的隆隆声。一只驳船就系在船尾一条长索上；驳船是灰色的，模样像一只土鳖。太阳不知不觉地浮到伏尔加河的上空；周围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的壮丽服饰上华美的褶皱，沿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远看像一块块甜饼干。金黄色的秋叶飘落在水面。

“你看，多美啊！”外婆一分钟也不停地这样说，她从船这边走到那边；她神采奕奕，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笑而不语，眼里含着泪水。我拽了拽她的印花布黑裙子。

“啊？”她哆嗦了一下儿。“我好像在打瞌睡，甚至在做梦。”

“可你哭什么？”

“我的宝贝，我哭，因为高兴，也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真是老了，我已年过花甲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善良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童话时，声音很低，很神秘，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脸，睁大眼睛看着我，仿佛在往我心里注入一种使人振奋的力量。她像唱歌，越往下讲，语言越流畅。听她讲故事，有说不出的愉快。每次听完我都求她：“再讲一个！”

“好，就再讲一个：从前有一个看家神，这老头儿坐在炉灶边，用面条扎进自己一只脚掌。他摇晃着，哼叫着：哎哟，我的老鼠，好痛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婆抬起一只脚，双手端着摇来晃去，可笑地哭丧着脸，真像是她自己在感觉痛。

一些飘着胡须、面目和善的水手站在周围，他们听完后也笑着夸她、求她：“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饭时，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背地里干的，因为船上有一个水手，他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他穿得像派出所的警察——衣服上有铜扣子，他成天醉醺醺的，人人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离我们远远的，一声不吭。她高大匀称的身材、生铁般的黑脸、像王冠一样盘在头上的那一堆淡黄色发辫——她稳健有力的全身，一切一切回想起来，就像隔着一层雾或者一层薄薄的云彩。她那对跟外婆一样大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看人。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人家笑话你哩，妈妈！”

“管他们呢！”外婆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个痛快吧！”

我记得外婆见到尼日尼的情景——她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她一只手拽着我的手，一只手推着我走到船边，大声地说：“你瞧，你瞧，好美啊！我的主啊，那就是尼日尼！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瞧那些教堂，真像在天上飞！”

她央求母亲，几乎要哭出来：“瓦留莎，你还是看一眼吧？你大概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着脸苦笑着。

轮船停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河上船只拥挤，几百根桅杆耸立。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木船划到轮船的一侧，木船用钩竿套住了放下的舷梯。于是，木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轮船的甲板。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穿着黑长衣，留着金黄色的胡须，长着一只鸟嘴鼻子和两只绿眼睛。

“爸呀！”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就扑到他怀里。他用一双又小又红的手接住她的头，快速地摸着她的脸颊，尖声厉气地说：“怎么啦？傻孩子。啊，原来这样……嗨，你们呀……”

外婆像陀螺似的转动身子，好像一下子就拥抱和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人们跟前，急忙说：“快去，快去！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是我们全家，你看有多少！”

外公问她：“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妈。”

他们对吻了三次。

外祖父从一堆人里把我拽出来，按住我的头问道：“你像是谁家的？”

“从阿斯特拉罕上船，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在说什么呀？”外祖父转身问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

说：“颧骨跟你父亲一样……爬到木船上去吧！”

木船靠岸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沿斜坡往上走，地上铺着大鹅卵石，两边陡峭的山崖覆盖着枯黄倒伏的野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大家前头。外祖父的个儿只到母亲的肩膀下，外祖父走路步子细而快，母亲像是在天上飘游，她要低着头才能望到外祖父。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头发乌黑溜光、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舅舅，头发浅黄卷曲的雅科夫舅舅，几个穿着鲜艳衣衫的胖女人和六个都比我年龄大的、安静的小孩。我跟外婆、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走在一起。纳塔利娅面色苍白，浅蓝色的眼睛，挺个大肚子，多次停下来，喘着气小声说：“哎哟，我不能走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婆生气地嘟囔着。

“一家子蠢货啊！”

这一家的大人和孩子，我都不喜欢。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是外人，甚至连外婆也好像失去原来的光彩，离我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我马上觉得他是我的对头，而且他也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警惕和好奇。

我们走完了这段斜坡。坡顶上，依着陡峭的山崖开始出现一条街道，街口坐落着一栋低矮的平房。房子上涂的粉红色油漆已经很脏了，房盖低垂，窗户外鼓。从街面上看，我觉得这房子很宽；但房子里面，由于分成一间间昏暗的房间，就显得很拥挤。屋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在忙东忙西，孩子们像一群偷食的麻雀窜来窜去，到处都是刺鼻的怪味，简直像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使人感到不愉快。整个院子都挂着大幅大幅的湿布，摆着盛有五颜六色液体的染缸。缸里面泡的也是布。在墙角另外搭的一间低矮半毁坏的小屋里，炉子里的柴火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开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大声说着几个奇怪的词：“紫檀素——品红——硫酸盐。”

第二章

内容深沉、色彩斑驳、离奇无比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展开



了。在我的记忆里，这一段生活是一个由善良的天才忍着痛苦的真实而巧妙讲述的一个严酷的童话。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有时都难以相信那确实发生过的事实，甚至宁愿反驳和否认掉其中的许多事实——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实实在太多了。

但真理重于怜悯，而且我不是讲我自己，而是讲普通的俄罗斯人曾经生活，甚至今天还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景象可怕、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

外祖父的家充满人与人的相互仇恨，这种气氛严重地毒害着大人，连小孩也热烈地参加进去。后来我从外婆嘴里知道，母亲到来时，恰恰是她两个弟弟正坚决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的突然回来，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尖锐、更加强烈了。他们怕我母亲会要求外祖父本来已经准备给她、但是因为她违背外祖父意志“自行做主”出嫁而被外祖父扣留的那份嫁妆。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两人。此外，谁在城里开染坊，谁搬到奥卡河岸库纳维诺村——他们彼此早就为这件事无情地争吵不休了。

我们到后不几天，在厨房吃饭的时候，他们大吵了一场。两个舅舅突然站起来，身子探过桌子，浑身颤抖，咬牙切齿地冲着外公大吼大叫，像两条狗。外祖父用汤匙敲着桌子，脸红脖子粗，像公鸡一样，响亮地喊道：“叫你们讨饭去！”

外婆痛苦地哭丧着脸，说：“全都给他们吧，老爷子！这样你会清静些，给吧！”

“住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叫喊着，两眼露着凶光。说也怪，他这样小的个儿，却能够叫得这样震耳朵。

母亲站起来，慢慢地从桌子走到窗前，背向着大家。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伸手照着弟弟的脸猛击了一下儿，弟弟大吼了一声，两人揪在一起，在地板上滚开了，他们又哼又喊，相互谩骂。

孩子们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绝望地喊叫，我母亲连抱带拖地把她拉走了。性格快活的麻脸保姆叶夫盖尼娅把孩子们撵出了厨房。椅子都倒了。年轻的学徒、宽肩膀的“小茨冈”骑上米哈伊尔舅舅的背，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从从容容地用毛巾捆他的手。

米哈伊尔舅舅拉长脖子，下巴稀疏的黑胡子擦着地板，可怕地哼着。外祖父围着桌子乱窜，高声埋怨道：“兄弟亲骨肉啊！嗨，你们呀……”

吵架刚开始，我就吓得跳到炉炕上，惊恐地看外婆从吊着的铜盆冲水洗雅科夫舅舅脸上的血。舅舅一面哭一面跺脚，外婆沉痛地说：“你们这些该死的野种，清醒过来吧！”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了肩头，对着她喊叫：“老妖婆，你生的这些野兽！”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婆钻到墙角里，颤抖地号啕着：“圣母啊，求你还我儿子的人性吧！”

外祖父侧身站到她面前，望着杯翻盘倒、菜洒汤流的饭桌，轻轻地说：“孩子妈，你看着他们，不然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的，说不定……”

“行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来补……”

她用手掌抱着外祖父的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他个儿比外婆小，把脸贴到她的肩上。

“看来应该分家了，孩子妈……”

“应该，孩子爸，应该！”

他俩谈了很久。开始还挺融洽，后来外祖父用脚搓起地板来，像斗架前的公鸡。他指着外婆的鼻子，大声地耳语：“我知道你，你比我爱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是个大滑头，雅什卡又是个自由派！他们会把我的财产喝光花尽……”

我在炉炕上笨拙地翻了一下儿身，把熨斗碰倒了。熨斗顺着炕梯丁丁当地往下滚，扑通一声掉进脏水盆里。外祖父一步跳上炕梯，把我拖了下来，对着我的脸仔细打量起来，好像是头一回见我似的。

“是谁把你放到炉炕上的？是妈妈？”

“是我自己。”

“胡说。”

“没有胡说，是我自己。我害怕来着。”

他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把我一推。

“太像你爸爸了！走开！”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



我那时就看得很清楚，外祖父那对聪明锐利的绿眼睛在注视着我，我害怕他。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我一直想避开这一对烫人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很厉害。无论他跟谁说话，都是嘲笑、侮辱、挑衅，极力惹对方生气。

“嗨，你们啊！”他常常感叹。这个长长的“啊”每次都使我感到寂寞无聊，不寒而栗。

在休息的时候，在喝晚茶吃点心的时候，在外祖父、两个舅舅和伙计们疲倦不堪从作坊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双手被紫檀素染红、被硫酸盐烧伤，头发用条带子箍着，全都像放在厨房角落里的一个个黑色圣像——就是在这种危险时刻外祖父总是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跟我谈话——这要比跟他的孙子们谈话多，因而使他们羡慕不已。他个儿匀称，有棱有角，又瘦又尖。他的那件丝线缝的圆领绸坎肩已经破旧不堪，印花布衬衫也皱皱巴巴，裤子的两个膝盖上还各有一块大补丁，不过他的衣着还显得比他的两个儿子要干净、漂亮些——他俩穿着西装上衣和护胸，脖子上却系着妇女用的三角围巾。

我们到后只几天，他就逼我背祷词。别的孩子都比我年纪大，已经在“圣母升天”教堂跟读经助祭学认字了。从家里的窗户可以看见教堂的金顶。

教我祷词的是文静胆小的纳塔利娅舅母。她的小脸跟儿童的一样，眼睛透亮透亮的，从里面我仿佛觉得可以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看她的眼睛。她眯起眼睛，转悠着脑袋，轻声地求人，几乎像在耳语：“喂，请你念：‘我们的天父，您是……’”

如果我问“什么是‘雅科——热’”，她胆怯地看看四周，然后劝我：“你不要问，问就更糟！你简单地跟我念：‘我们的天父’……念吧？”

为什么“问就更糟”呢？——这疑问使我不安。“雅科——热”这个词的意思不明白，我故意用各种方式把它念得变了样儿：“‘雅科夫——热’，‘雅——夫科热’……”

但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舅母还是用她那越来越上气不接

下气的声音耐心地纠正：“不对，你简单地念：‘雅科——热’……”

但是，她本人和她的话都不简单。这使我着急上火，妨碍我记祷词。

有一次，外祖父问：“喂，阿廖什卡，你今天干啥了？一定是玩！凭你额头上那块青疙瘩我就知道。赚一块青疙瘩不算高明！《我们的天父》一章念熟了吗？”

舅母轻声地说：“他的记性不好。”

外祖父冷笑了一声，快活地扬起红眉毛。

“要是这样，那就得揍！”

他又问我：“父亲揍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什么，也就没有吭声，母亲却接过来说：“没有，马克西莫从不打他，也不许我打。”

“为什么呀？”

“他说，打不成材。”

“处处表现他是个傻瓜，这个马克西莫！上帝原谅我说死人的坏话。”外祖父生气地、清楚地说。

他的话使我感到屈辱难过。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干吗撅起嘴？你呀……”

他抹了抹露出银丝的红头发，加了一句：“我星期六正要为顶针抽萨什卡。”

“怎么‘抽’呢？”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祖父却说：“等等你就看到了……”

我背地里琢磨：“抽”就是“抽线”，意思是把送来染色的衣裳“拆开”，而“揍”与“打”才显然是一回事。人们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是我见过的。但我从未见过这样抽打小孩，虽然这里的舅舅常常弯着手指敲自己孩子的额头和后脑勺——孩子们对此满不在乎，只是搔搔敲疼了的地方。我不只一次问过他们：“疼吗？”

他们每次都勇敢地回答：“不疼，一点儿不疼！”

顶针那件事我是知道的，当时轰动了全家。一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中间这段时间，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师傅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缝成一件“东西”，再在上面别一个厚纸签。那一天，

米哈伊尔舅舅想戏弄一下儿半盲的格里戈里师傅，指使九岁的侄儿萨沙在烛火上烧红师傅的顶针。萨沙用镊子夹着顶针在烛火上烧，硬是把它烧红了，偷偷地放到格里戈里师傅的手底下，然后就躲到炉子的后面去了。恰好这时外祖父来了，他坐下干活，顺手把一个指头插进那只烧红的顶针里。

我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时，外祖父正在用烫着的手揪耳朵，可笑地连蹦带叫：“这是谁干的？你们这些坏蛋！”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用一个指头拨弄着顶针在桌上滚，一面对它吹气。格里戈里师傅不动声色地在那里缝东西，人影在他那巨大的秃脑袋上蹦跳。雅科夫舅舅也跑来了，他躲到炉炕的拐角后面，偷偷地笑。外祖母用擦板擦生土豆。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突然米哈伊尔舅舅说。

“胡说！”雅科夫舅舅从炉炕后面跳了出来。

他儿子就在那个角落里哭了，叫道：“爸爸，别信他。是他叫我干的！”

两个舅舅互相骂起来。外祖父反而马上平静下来，把擦碎的土豆敷到那个指头上，拉着我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过错。自然我在喝茶时间问了一句：“要不要揍他抽他？”

“当然要。”外祖父嘟哝说，还斜着眼看了我一下儿。

米哈伊尔舅舅使劲儿拍了一下儿桌子，对着我母亲大叫：“瓦尔瓦拉，管好你的狗崽子，不然我就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你敢，你敢动他……”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母亲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好像三言两语就能把别人推开、甩开，他们也因而变得渺小。

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怕母亲，甚至外祖父跟她说话也跟别人不一样——声音要小。这使我心里高兴，我常常在表哥面前夸耀：“我母亲最强大！”

他们没有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摧毁了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

还没有到星期六，我也犯了错误。

大人们那么灵巧地改变布的颜色——我觉得很有趣。你